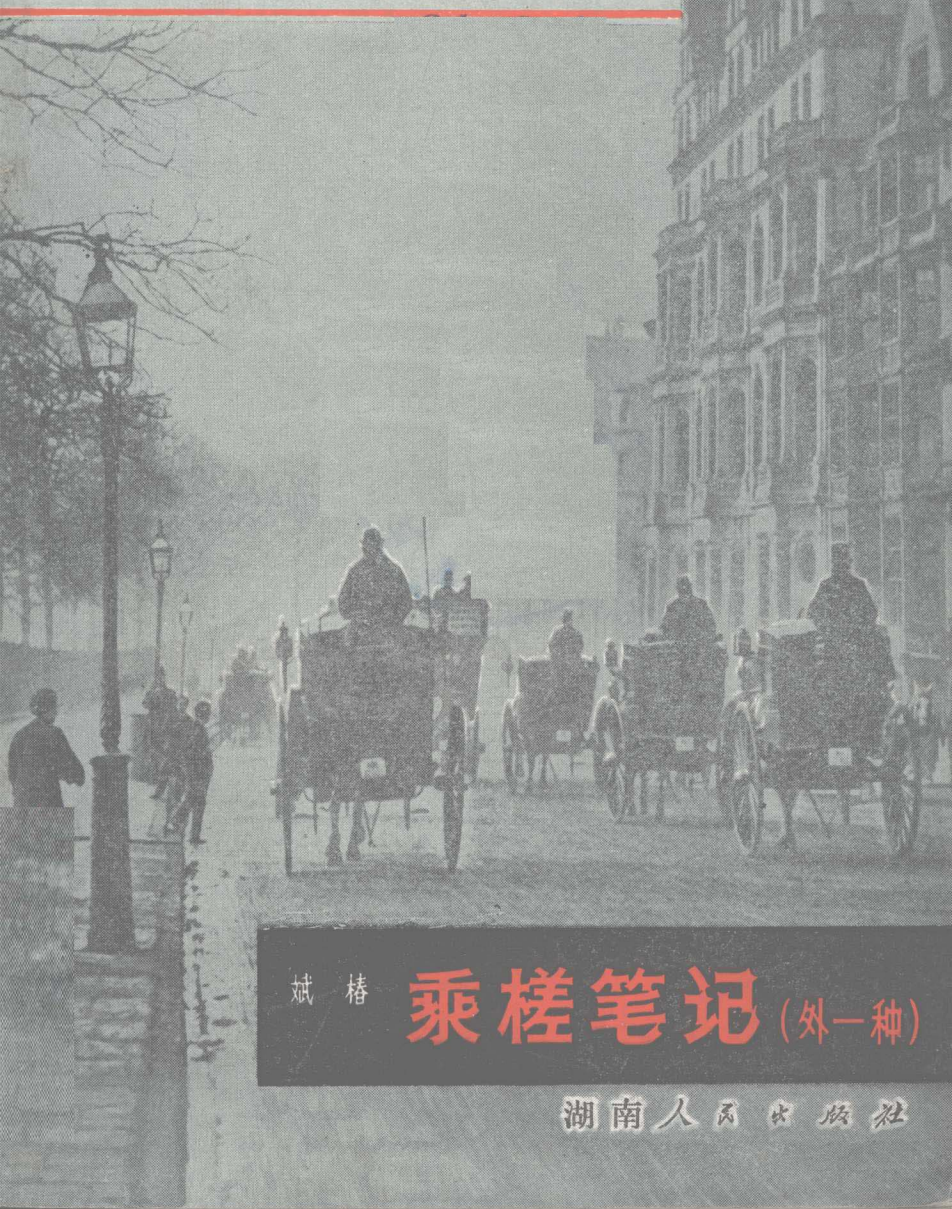


从东方到西方的最早的脚印
中国人对欧洲的最初的观察



斌 椿

乘槎笔记 (外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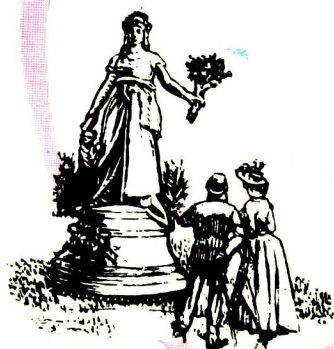
湖南人民出版社

走向世界叢書

乘槎筆記 (外一種)



校点 钟叔及 校点 梧高 校点 鍾谷 校点 鍾清



乘槎笔记(外一种)

斌 椿 著 谷及世 校点

责任编辑: 钟叔河

装帧设计: 易 地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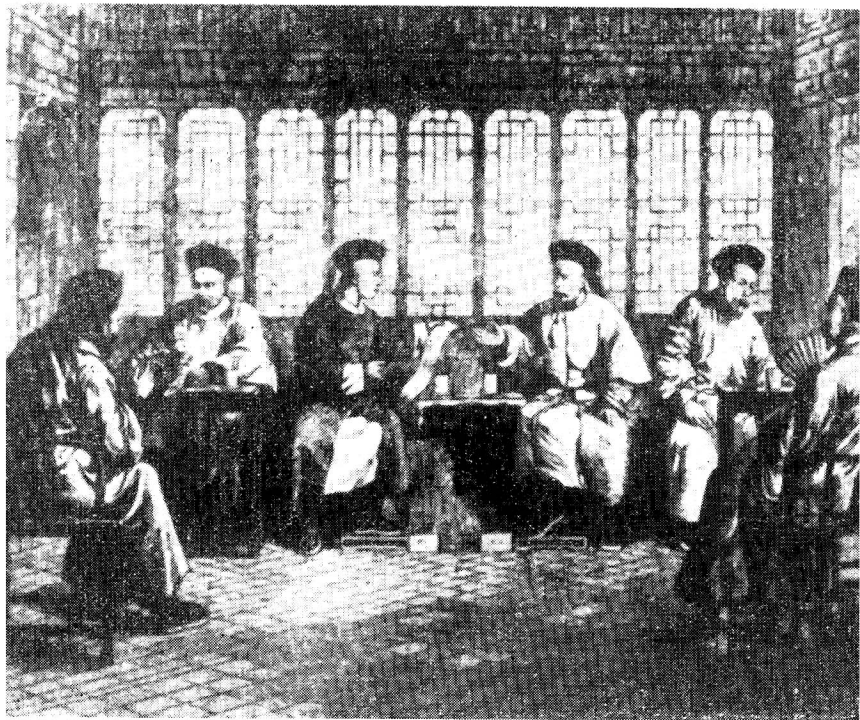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100,000 印张: 5.25 印数: 1—10,000

统一书号: 11109·171 定价: 0.53元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主要官员

本书作者就是由这个衙门派遣出国游历的。(十九世纪的铜版画)

(右一) 马可·波罗(1254-1324)

此为传世最古之马氏画像藏于
罗马Badia氏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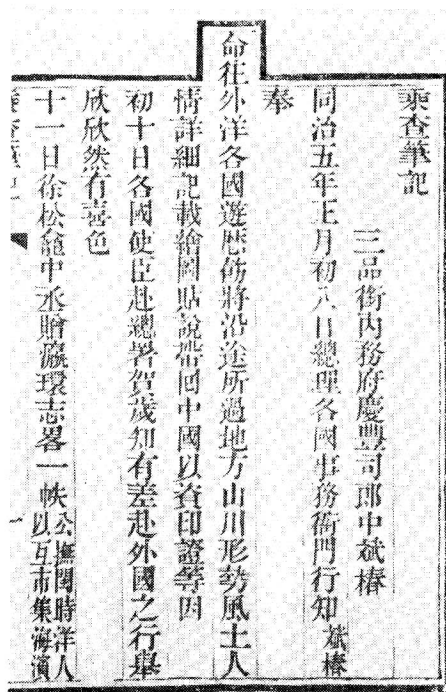
(右二) 马可·波罗的遗嘱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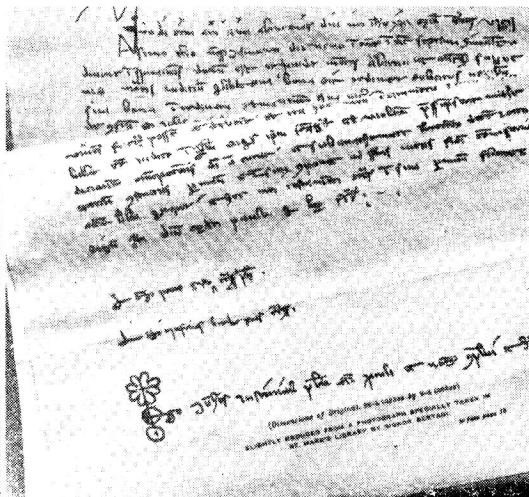
最后一段大意为：“违此嘱者，
神明殛之，神父诅咒之，并须赔偿
执行人流金五磅，是所至嘱。

马可·波罗(签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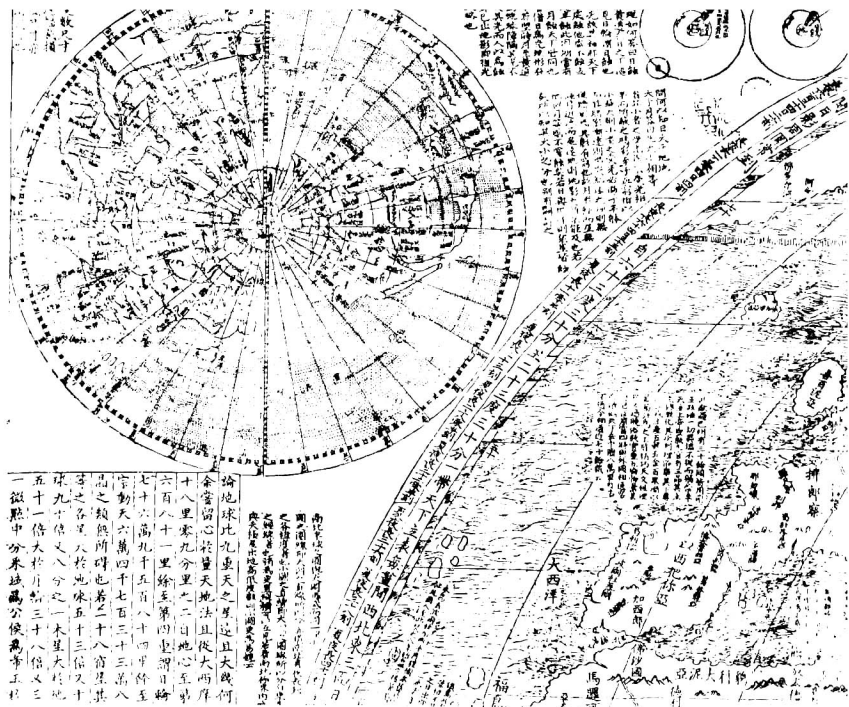
《乘槎笔记》初刻本的封面和首页





1477年纽伦堡版《马可·波罗游记》

“封面四周之古德文 题词为：此乃威尼斯大游历家马可·波罗之像，彼曾将日出处至日落处之世界奇事为彼所亲见者记录于书，以遗吾人，书中所言，皆前所未闻也。”



(上)中国最早的欧洲地图

1584年利玛窦绘制之《坤輿万国全图》的欧洲部分。

(右一)利玛窦和徐光启

利瑪竇(1552—1610)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介绍欧洲的西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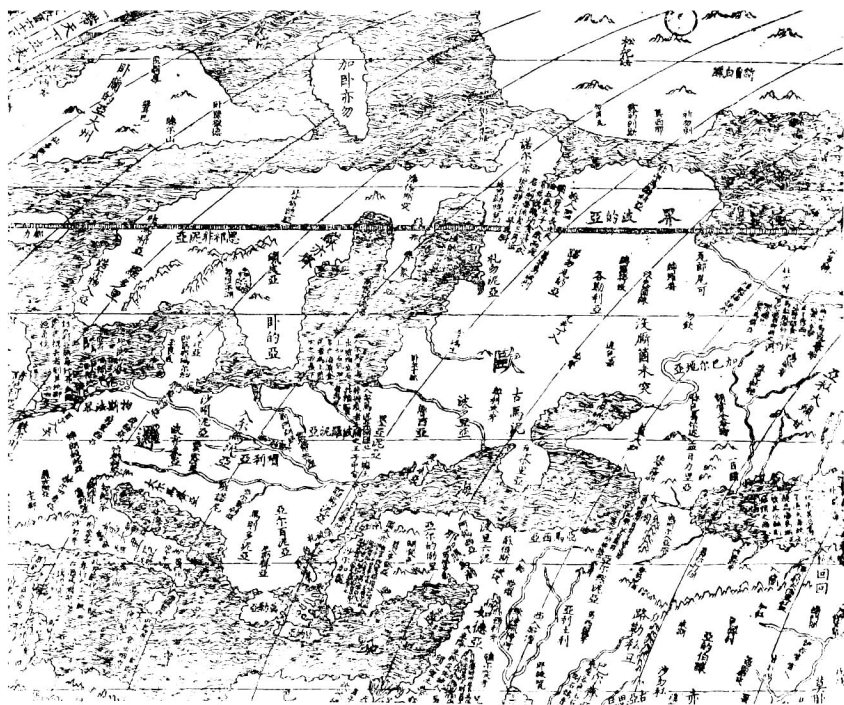
(右二)《职方外记》提要

艾儒略所撰《职方外纪》被收入了《四库全书》。

(右三)《职方外纪》附图之一

系明天启三年据利玛窦原图重绘刊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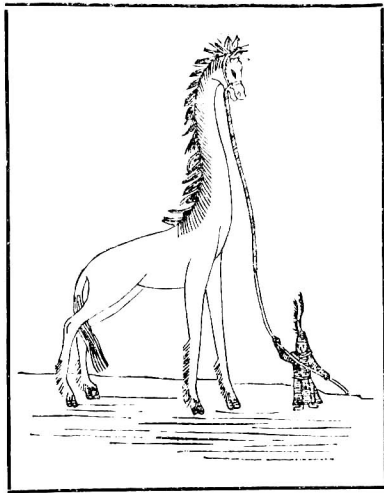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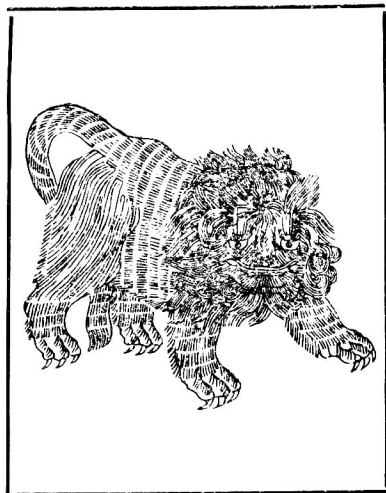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職方外紀五卷明西洋人艾儒略撰其書成於天啟癸亥自序謂利氏竊進萬國圖志龐氏奉命翻譯儒略更增補以成之蓋因利瑪竇我迪舊本潤色之不盡儒略自作也所紀皆絕域風土為自古輿圖所不載故曰職方外紀其說分天下為五大洲一曰亞細亞洲其地西起那多璵亞離福島六十二度東至亞尼倫峽離福島一百八十度南起瓜哇在赤道南十二度北至冰海在赤道北七十二度二曰歐羅巴州其地南起地中海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北至冰海北極出地八十餘度徑一萬一千二百五十里西起西海福島初度東至阿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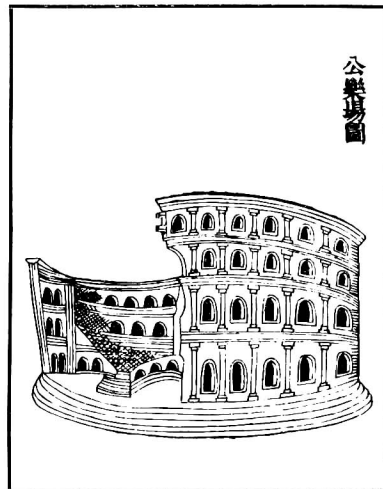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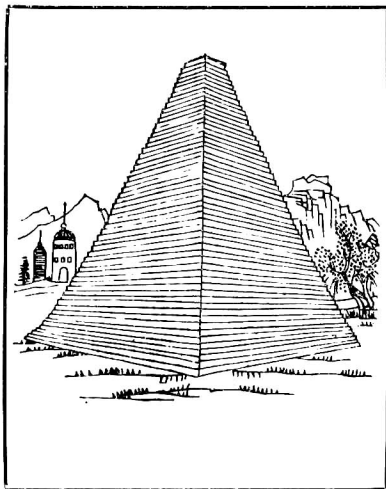


《坤輿圖說》選刊

清初來華西洋教士南懷仁撰刻，全書有圖三十餘幅，其中的《七奇圖》最早向中國人介紹了古代世界七大奇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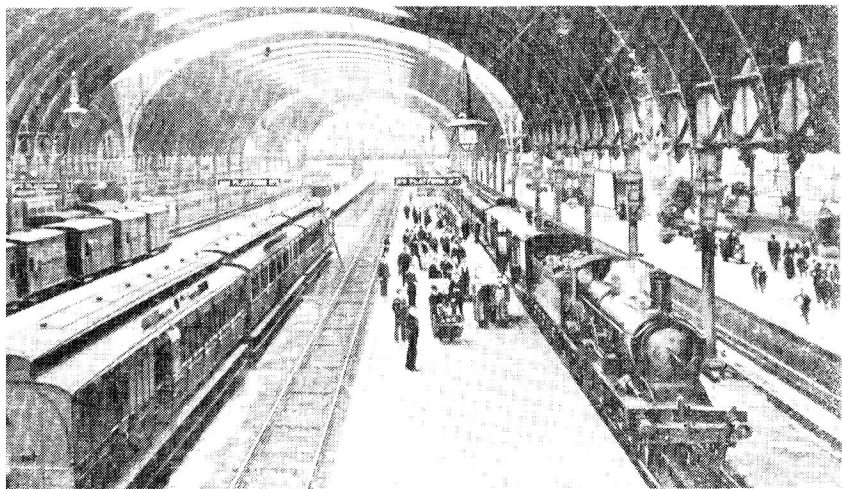


海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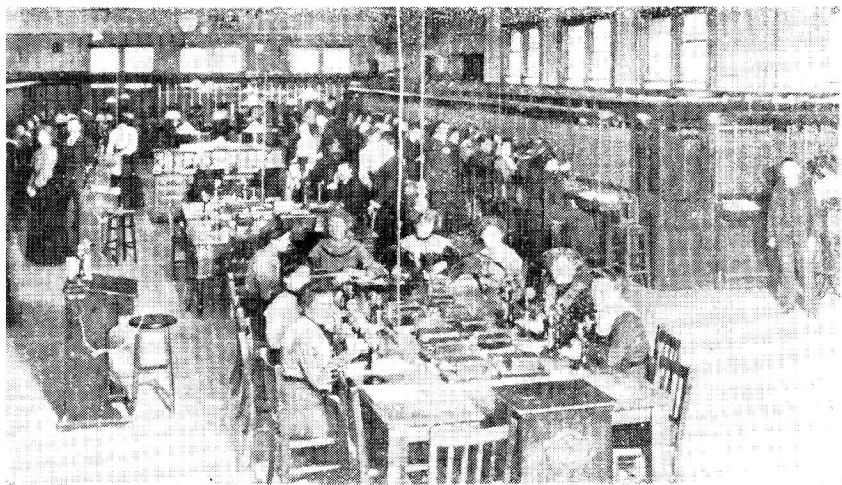


公衆場圖

从左至右： 1. 獅； 2. 恶那西约(长颈鹿)； 3. 把勒亚鱼(鲸鱼)； 4. 海船图
5. 七奇图之一，巴比鸞城； 6. 七奇图之二，铜人巨像； 7. 七奇图之三，尖形
高台(金字塔)； 8. 罗马公乐场(罗马竞技场)。



十九世纪的伦敦火车站 “……火轮车前为火轮器具，烧石炭，贮水激轮；后车以巨钩街其尾，蝉联三四十辆，中坐男妇多寡不等，每辆如住房一所。”（三月十日记）



百年前的英国电报局 “电信信，外洋各处皆有。代人寄信，以铁线之一端画字，其一端在千万里外，即照此字写出，不逾霎刻也。”（三月十八日记）

《走向世界丛书》总序

人们常说，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rapidly shrinking world）。在电视卫星、激光通信和波音747时代，地球上各个部分之间的距离，好象越来越短；各国人民的互相接触和交流，也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

可是，仅仅在几代人以前，“异国”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古代欧洲人说，中国用小米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喂到第五年虫肚子涨裂开，就从里面取出丝来（波桑尼阿《希腊纪事》Ⅶ.XXⅦ.6—9）。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西方有的羊羔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脐带还连着大地（《旧唐书·西戎传》拂菻一节，清代康熙朝御制《渊鉴类函·边塞部九》）。这类“海外奇谈”，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在过去上千年中，却一直被当作可靠的知识，记载在欧洲和中国的史书上。由此可见，人类文明的发展，确实是经历了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

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象纪念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一样，历史将永远铭记着张骞、玄奘、鉴真、郑和、马哥波罗、哥伦布等不朽的名字。可以这样说：一个国家和民族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往往也就

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原始森林里徘徊。而自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中国却渐渐地落后了。在西欧（后来还有美国和日本）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后，中国还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范文澜称林则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林则徐首当其冲，他亲身感到世界在缩小，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把外国隔开了。

封建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严夷夏之大防”的精神世界里闭锁了许多年。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顽固守旧派的办法是学鸵鸟。象慈禧太后的大学士徐桐，见到“洋人”就“以扇蔽面”。庚子年间他焚香跪请骊山老母下凡来“杀尽洋人”，结果骊山老母没有下凡，自己的命却送掉了。林则徐、魏源等则不同，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那就是：学习外国的长处，来对付外国的侵略。要学习，先得了解，于是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编了《海国图志》。虽然他们没有亲自出国去考察，书的材料靠间接收集而来，难免有许多谬误。但无论如何，地里长羊羔之类的神话毕竟是逐步让位给常识了。

林则徐、魏源之后，中国开始有读书人走出闭锁的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游历和出使。容闳1847年留学美

国，斌椿、张德彝等1866年游历欧洲，志刚、孙家谷1868年出使泰西，这是最早的。出国的人数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去的政府官员，但一去就不会不接触近（现）代的科学文化、政治思想，也不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

《走向世界》这部丛书，收的就是早期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对外国的观察和感想。“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丛书以这一派人物的作品为主。有的人主观上虽不怎么追求进步，但所处地位重要，写的书又有历史价值和文学兴味，只要在政治和涉外方面没有严重问题，也酌予收录。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西方国家在许多方面比中国先进，值得中国人学习。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总是要压迫剥削比他们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触西方，既有一个如何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又有一个怎样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盲目排外的情绪是有的，盲目崇外的情绪也是有的。对于某些作品中流露的这类观点，我们为这套丛书撰写的评介文章，将适当地作些分析，请读者注意。

“洋为中用”是我们今天的主张，也是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也是“洋为中用”吗？当然，随着接触和认识的深入，人们慢慢地看出：仅

仅学一点“长技”，搞一点坚船利炮，还是不行的。“要救国，只有维新”，维新行不通，就只有革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在1878年出国以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才立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

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代后期的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建立了先进的社会制度。但是，世界的发展越来越快，我们的经济、科学和文化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这就必须继续打开眼界，走向世界。打开眼界以后，还要学会分析，分清好的和坏的。一切好的东西，要“拿来”为我所用；一切有害的东西，要实行抵制和预防。在这方面，前人的观察和体会，有一些也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谨将这套小小的丛书，奉献给爱好历史与文学、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希望它能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是为序。

编 者

一九八〇年七月

两千年岁月，五万里行程

——从《史记·大宛列传》到《乘槎笔记》

钟叔河

哥伦布以前，海洋环绕的亚欧大陆，就是人们心目中的整个世界。中国在极东，欧洲在极西，隔开五万余里；相互而言，都是“远在天边”的“世界的尽头”。

那时候，在世界上旅行是不容易的。庄子写《逍遥游》，描写鲲鹏变化，“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真是汪洋恣肆，将想象力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可是，当笔锋转向人间世时，连他也不能不如实地承认：“适百里者宿舂粮（去百里外的地方，得在先天晚上预备干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去千里外的地方，得带上三个月的口粮）。”这就是当时出门旅行的实际情形。

然而，人决不会永远甘心受局限。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世界变得宽大一些、丰富一些，希望能够了解别处的生活，得到别处的经验。于是，随着贸易和财富、国家和权力的出现，就有了长途转运的商人，有了交通联络的使者，有了走向世界的旅行家，也有了对于远方外国的好奇和希

望。

关于西方世界的情形，中国在远古就有过不少传说，如周穆王会见西王母之类。可靠的史料，至少可以上溯两千年。但直到一百几十年前，才有人亲自到欧洲记下自己直接观察的结果，——这就是《乘槎笔记》和《海录》，在此处合印为一册的两部书。

*

*

*

《海录》由一位盲人于1820年口述，经别人笔录整理而成。《乘槎笔记》则是1866年开始到欧洲游历的人的日记。论出世，《海录》在《乘槎笔记》之前；论内容，《乘槎笔记》却在《海录》之上。

《海录》的口述者谢清高，广东嘉庆州（今梅县）人，年轻时在海上遇险，被外国商船救起后，留在船上工作。此后十四年中，他遍历南洋、印度和欧洲；后来回国，不幸失明，在澳门以口译为生。他的乡人杨炳南，听到他所谈海外各国的事情，多为过去书籍所未载，觉得很有价值，于是将其记录整理成书，刊行于世。此次据《海山仙馆丛书》和《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两本校勘，酌予分节标题，并重订目录。

《乘槎笔记》的作者斌椿，是一位年老的读书人。他出身汉军旗，当过知县，能文能诗，关心时事，跟地理学家徐继畲、大数学家李善兰等是朋友。同治三年，他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属“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请去“办理文案”，开始接触洋务、洋人。同治五年，总理衙门派同